

北宋“舞楼”碑刻的新发现

车文明

《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

—

摘要：

中国古代的剧场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商业性剧场，如瓦舍勾栏与茶园酒楼以及戏园子；神庙剧场，包括遍布广大城乡的各种庙宇剧场、祠堂剧场、会馆剧场等；宫廷剧场；王公贵族私家园林剧场。临时性剧场。其中，中国神庙剧场是中国古代剧场中绵延不绝、范围最广、数量最多的剧场类型。据现有材料可知，中国神庙剧场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地域分布在今山西南部、东南部，经典资料是先后发现的三通北宋神庙中修“舞楼”、“舞亭”的碑刻。近年，在晋东南的长子县，又发现了一通北宋创建“舞楼”的碑刻，弥足珍贵。本文公布碑刻全文，并略加解读，阐发其价值，以飨读者。

中国古代的剧场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商业性剧场，主要是出现在宋元时期大城市的瓦舍勾栏与清代中后期一些大都市的茶园酒楼以及戏园子；神庙剧场，包括遍布广大城乡的各种庙宇剧场、祠堂剧场、会馆剧场等；宫廷剧场，包括历代宫廷里的各种剧场；王公贵族私家园林剧场，主要是历代王公贵族建于私家庭院及园林里的剧场。临时性剧场，主要指在广场街道或旷野临时搭建的舞台，用毕拆除。当然，中国戏剧具有无处不歌舞的特征，举凡厅堂、舟船、街道、广场、院落，均可以撙地做场，但因为这些临时借用的场所没有相对固定的演出与观剧场所，一般不把它们作为专门性剧场来研究。其中，中国神庙剧场是中国古代剧场中绵延不绝、范围最广、数量最多的剧场类型。研究中国戏曲史的人，一般认为中国戏曲形成于宋金时期。而神庙“舞楼”之设，亦始于北宋。所以，

被视为神庙剧场专门性表演场所的北宋“舞楼”的出现，备受学界关注。

“舞楼”之称，唐代即有。《全唐诗》中有不少涉及舞楼的作品，如孟浩然《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园即事，得秋字》：“郁岛藏深竹，前溪对舞楼。”^{1[1]}许浑《金谷桃花》：“花在舞楼空，年年依旧红。”^{2[2]}皮日休《襄州汉阳王故宅》：“戟户野蒿生翠瓦，舞楼栖鸽污雕梁。”^{3[3]}这些舞楼大致是建于庭院、园林之中，经常用作歌舞之场所，与后世神庙剧场中的专门性戏剧演出场所“舞楼”、“舞亭”、“舞厅”、“乐楼”乃至“戏楼”等是不同的。

首次发现北宋神庙舞楼碑刻的是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学家卫聚贤，他在《元代演戏的舞台》中介绍了宋、元、明、清修舞亭（庭、厅、殿）碑各1通，其中就有山西省万泉县（今万荣县）万泉乡桥上村后土庙北宋天禧四年（1020）刊刻的《河中府万泉县新建后土圣母庙记》碑阴“修舞亭都维那头李廷训等”信息^{4[4]}。解放后，墨遗萍《记几个古代乡村戏台》又作了介绍^{5[5]}。1982年，王遐举写专文《晋南万泉县宋初修舞亭的碑文》论述此碑。文章逐录了碑阴大部分文字，其中包括“修舞亭都维那头李廷训等”18人的姓名，并附上碑阴拓本照片。文章对宋初乡村庙宇出现舞亭的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并重申一切戏曲产都起源于民间的观点。

后来，又陆续在晋东南的沁县、平顺发现了两通北宋修舞楼的碑刻。沁县城关关帝庙宋元丰三年（1080）《威胜军新建蜀荡寇将□□□□关侯庙记》，碑阴《修关王庙施主题名记》中有“正殿三

^{1[1]} 《全唐诗》卷一百六十《孟浩然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册，第1643页。

^{2[2]} 《全唐诗》卷五百三十一《许浑四》，同上书，第16册，第6067页。

^{3[3]} 《全唐诗》卷六百十三《皮日休六》，同上书，第18册，第7067页。

^{4[4]} 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31.12.15。

^{5[5]} 《戏曲论丛》1957年第2期。

间，舞楼一座，南北廊上下共二十口”之记载^{6[6]}。平顺县北社乡东河村九天圣母庙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潞州潞城县三池东圣母仙乡之碑》有“再修北殿，创起舞楼”之记载，碑阴亦载：“元符三年庚辰岁十二月癸巳朔辛卯刻字毕。修舞楼老人苗庆、刘吉、秦灵，……圣母之庙创建舞楼……修舞楼维那一十五人……。”黄竹三、张守中、杨太康《从北宋舞楼的出现看中国戏曲的发展——山西中南部三通戏剧碑刻考述》对三通碑刻做了全面论述，亦提出“艺术起源于民间，中国戏曲的源头在农村”的观点^{7[7]}。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附录将三通碑刻正、反面碑文全部逐录^{8[8]}。2002年，冯俊杰主编的《山西戏曲碑刻辑考》重新将三通碑刻正、反面碑文逐录、标点，并对碑文作者、碑刻内容及其戏曲史料价值进行了简要的考述^{9[9]}。至此，三通宋代戏曲碑刻广为人知，且被频繁征引，成为中国剧场史、中国戏曲史研究中的经典文献。

三通碑刻所属之庙宇，仅平顺东河村九天圣母庙存，但北宋的舞楼已演变成经明代重修扩建后，位于正殿前的献殿，也叫“侑舞楼”。其余两座庙荡然无存，仅有这两通石碑幸存。几经辗转，万荣桥上村宋碑已移至山西省博物院保存展出；沁县关王庙宋碑移至本县南涅水石刻馆保存。

1980年代以后，戏曲文物的发现不断增长，荦荦大成，但有关宋代舞楼碑刻的发现则呈现停滞状态。令人欣慰的是，在沉寂了20多年后，有着戏曲文物宝库之称的山西省又传来喜讯：长子县丹朱

^{6[6]} 丁明夷《山西中南部的宋元舞台》，《文物》1972年第4期。

^{7[7]} 黄竹三等《从北宋舞楼的出现看中国戏曲的发展——山西中南部三通戏剧碑刻考述》，《蒲剧艺术》1983年第2期；《曲苑》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

^{8[8]}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9[9]} 冯俊杰主编《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中华书局2002年1月版。

镇南鲍村汤王庙北宋大观三年（1109）碑中又现“舞楼”二字。碑名《大宋故汤王之庙碑》，高 140 厘米，宽 63 厘米。笏头，额题“汤王庙碑”，现存南鲍村汤王庙穿亭西侧墙壁上^{10[10]}。此碑最早为长治市博物馆研究人员秦秋红发现，后告知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长治学院历史系教师段建宏。段建宏在其博士论文中首次披露，但未作详论，亦未附碑文^{11[11]}。现将碑文逐录、标点如下：

大宋故汤王之庙碑

邑下草泽韩休复撰并书

盖闻祠堂古建，舞楼新修，前莅漳水，东注而寒潭□；□黄百谷，烟光而暮山紫；南眺秦关，连云之横□□。□□路丹朱之古隍，长川相接，府邑□□，人杰移风、仕清易俗。时惟九月，叙应三秋，天选明王，莫大乎盛德；日照黎民，莫大乎归仁。贤□至则蒸民仰之，哲仁存则天地覆育，可谓三皇□宗，五帝之族。乃云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惟□□氏，帝尝元妃，□吞丸卵而生子契，为尧司徒，教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训夫妇之别，成长幼□□，及朋友之信。契

^{10[10]} 因此未知是否有碑阴刻字。

^{11[11]} 段建宏《戏台与社会：明清山西戏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同名著作于 2009 年 12 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 38 页。

至成汤八迁，凡一十四世，五百餘岁，去圣世远，天再命汤。是故王姓子讳天乙，惟其王性，兹率厥典，奉若天命。汤伐桀，以诛邪虐之君；放南巢民，显克仁之治。桀失天下，失其民心；汤得天下，得其民心。当兹之时，十一征而无敌於天下，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乃明□之德，天乃锡王之□，表正万邦之□。天生聪明，性长能□。有桀之不德民，如坠於涂炭；惟王之□仁众，若免於繯绁。遭七载旱，视民如伤，亲诣碭山，天赐甘泽。每岁夏阻苗槁，求之获瓛滂霈。万世之无朽，全杖圣王之美德。尊者莫过於乡人尊之，重者莫过於仕民重之。承雨露之恩，永锡千箱之实，万仓之盈，乃其全也。今皇八业，万国欢心，爱育鳏寡，存□孤独，臣胜戎羌，远人来服，毕□方物，明其中国，以通神明之德，秉光四海之行，效汤之所为，斯之谓兴。唯有乡首言曰：“诸神舞宇甚完，惟其汤庭未备，然而众饰。”遂乃经营，匠斲梓材，构及塗墍，专勤□墉，及以丹雘。舞宇工毕，因而耄者乡录奠神，高宾满座。曰为之铭。嗟乎！小子惭

以不才，幸承感於□里，所作浮辞，及隐望於群公。自竭鄙怀，一言短引。时大观三年岁次己丑九月壬寅朔二十日辛酉，故志序。铭□：

祠堂舞宇兮千年不朽，山川漳水兮万世无穷。

明王有德兮民尚钦仰，蒸民永福兮仓廩盈丰。

国家存恤兮鳏寡孤独，万邦□则兮物宜所通。

邻里乡党兮常存仁义，岁月杳冥兮兴亡事蒙。

录翁□□□□□□□书（缺文）

乡鼓笼张喜 鼓笼王智

纠司常允 录事□□□□□□□

鼓笼贺善 鼓笼王仲

刊字牛怀政

此碑《长子县志·金石志》不载，亦不见其它中籍，纯属宋代碑刻资料的新发现。这不仅对中国古代居值，对社会史、民间宗教信仰以及宋代文价值。

长子古属冀州。商为黎国地(一说长邑。春秋时代，为晋之长子邑。秦置设在长子。西汉，置长子县隶属上党郡。为长子公国。晋代，置长子县，隶属上党386年)，五胡之一的鲜卑族慕容永建立子，历时8年后，西燕被慕容垂所灭，归北魏，置长子县，隶属上党郡。后时有县，隶属于上党郡。唐隶潞州。宋代，金代隶属于潞州。元代沿袭金制。明代，(1529)，属潞安府。清代，属潞安府，归(1928)直属山西省。共和国成立后，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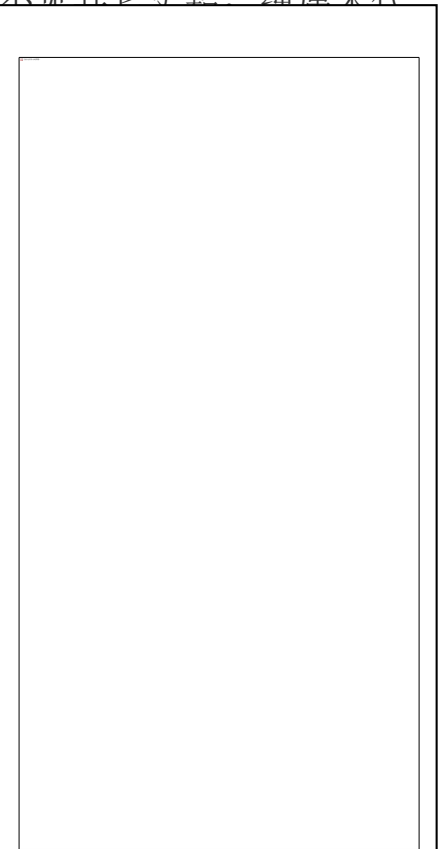


图 1：长子县南鲍村汤王庙
宋大观三年碑

区、晋东南专区、晋东南地区。1985 年 5 月，实行市管县体制，晋东南地区分为长治、晋城两市，长子县属长治市，县治在丹朱镇（传说尧的长子丹朱封于此，故名）。

按：河北漳河位于河北省、河南省之间，源出晋东南山地，有清漳河与浊漳河两源。漳河流域是商人早期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商人所以称商，大概是由于商人远族居于漳水，而最早，漳水或者就叫商水的缘故^{12[12]}。当代著名考古学家邹衡也认为：

“商文化是来自黄河西边的冀州之域，是沿着太行山东麓逐步南下的。”^{13[13]}又说先商文化“应该是从山西省来的”。^{14[14]}在古代，漳河流域的汤王崇拜非常普遍。如此，晋东南众多的汤王庙的修建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15[15]}。而长子县南鲍村汤王庙在漳源北岸。既然这里是商人祖先活动的地域，长子县南鲍村就是商人的后代，碑文中所谓“尊者莫过意。所以立庙奉祀汤王，同时将庙宇称做顺理成章了。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非碑文中所言“元妃”。另：“契

^{12[12]} 参见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斯维至、杨华编《上古时代（上册）》第二章“商殷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226 页。

^{13[13]} 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年。

^{14[14]} 邹衡：《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5[15]}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 2011 届研究生学位论文《山西地文物部门提供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所建汤王庙 161 座。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晋剧研究》之“附录 A”，2011 年 4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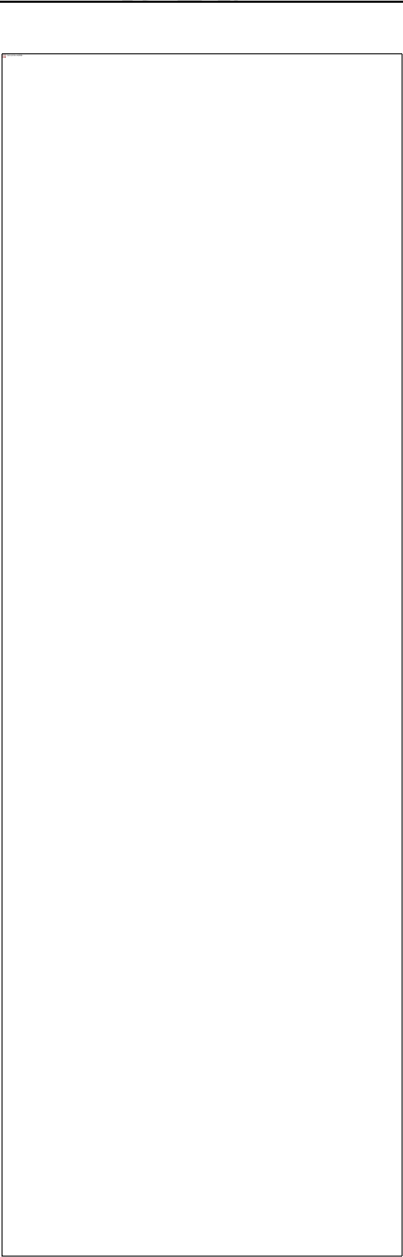


图 2：长子县南鲍村汤王庙
宋大观三年碑拓本细部
1

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乃帝舜命契推行五教，非碑文中所言帝尧。《索引》：“樵周云：契生尧代，舜始举之，必非啻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¹⁶[\[16\]](#) 碑中八迁，十四世之说与《史记》合。

碑中赞商汤“十一征而无敌於天下，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之事，见于《孟子·滕文公下》：“汤使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17[17]}

大禹时的水患，商汤时的旱灾，在华夏先民中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记忆，于是“禹水汤旱”在古代典籍中频繁出现，也有了大禹治水与商汤祈雨的感人传说。碑文中也特别提到商汤祈雨的功勋与美德。有学者通过识别、分析甲骨文及钟鼎文中的古文字“堇”，来说明传统文献所记载的商汤祈雨的故事是历史的真实¹⁸[18]。较早明确记载商汤祈雨的传统文献是《墨子》：“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¹⁹[19]此言商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以辞说于昊天上帝。《吕氏春秋·季秋纪·顺民》亦载：“昔商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仍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早麦生，麦死，民乃得毋饥。”²⁰[20]

16^[16] 《史记》卷三“殷本纪”，中华书局点校

17^[17] 《孟子·滕文公下》，《十三经注疏》本影印阮刻本，1980年版，第二册，第2680页。

18^[18] 张宝明《从甲骨文钟鼎文看“堇”字的文实》，《汉字文化》2003年第4期。

19[19] 《墨子·兼爱（下）》，《诸子集成》，册，第76-77页。

20[20]《淮南子·主术训》云：“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抱质效诚，感动天地。” 21[21]这里着重突出古代圣王心系万民，为了天下苍生而勇于自我牺牲的高尚品德与伟大精神；同时也印证了古人认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就能感动天地的朴素的天人合一的观念。汤王以身祷雨处，古籍多载为一个叫做“桑林”的地方，而桑林在何处？则众说纷纭。其中，位于晋东南的山阴阳城县桑林乡以及析城山是传说附会中众多汤王祷雨处中的重要一处22[22]。

南鲍村位于长子县城东南约 5 公里处，庙在村北一高冈上。庙已有些破败，现存比较完整的建筑有正殿、献殿，其余侧殿、两廊、舞楼已坍塌。正殿建筑年代较早。硬山顶。通面阔三间 11.4 米，进深两间 8.3 米。前檐小梅花石柱，素平础，施阑额、普柏枋，断面呈丁字形。柱头斗拱，四铺作单昂，用假昂。正心枋两层，在下一层隐刻泥道慢拱。耍头蚂蚱头，令拱上用替木托檐枋，设齐心斗。补间不施斗拱，仅在正心枋间垫小斗。六架椽屋，四椽栿对乳栿前后四柱。金柱用不规则方形石柱。蜀柱上皆施斗拱。从风格上看，正殿应为金代建筑。正殿左右有侧殿各三间。紧靠正殿南为献殿（亦称香亭、穿亭），卷棚三间，阔同正殿，进深 3.6 米，用石柱，鼓磴础。无斗拱，结构简洁，建筑年代较晚。脊枋有“二年”题记，疑为民国二年。院东西各有厢房（禅室）三间，已有坍塌。院南为戏台，五间，顶部已无，仅存三面围墙与台基。台左右有厢房各一间，东边辟门，西边为屋。据庙内清道光十八年（1838）《重修汤王庙碑记》23[23]，“庙不知创自何年，惟宋大观三年有重修碑石可辑。自宋而元，而明，以及国朝七百余年不闻某年某人再为修葺，即有小补，亦无考矣。”其实代有重修是不

20[20] 《诸子集成》第 6 册，第 81 页。

21[21] 《诸子集成》第 7 册，第 130 页。

22[22] 参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四《河东道五》，《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影印本，第 469 册，第 372 页。

23[23] 道光十八年《重修汤王庙碑记》，邑庠生罗文明撰文，笏头，碑高 190 厘米，宽 80 厘米，为余庙内东侧殿外。

争的事实，比如现存正殿就是金代遗构即为明证，只是未留下有价值的金石文字记录。庙内当时有汤王圣殿三间、香亭三间、东西禅室各三间、舞楼五楹、禅门一所，与现存建筑相符。本次重修工程：“重修香亭三楹，东西禅室各三楹，创修五谷财神殿三间、龙王殿三间，东西雨棚两处，门房一所，茶亭、厂棚两处。”新增之建筑多数亦坍塌。现存舞楼遗址或许就是北宋舞楼遗址。

北宋舞楼建筑实例已无遗存，但从现存庙宇规制以及金元遗存之舞楼中可以勾勒出它的大致概况。它建在神庙正殿前的庭院中，正对正殿，建在有一定高度的台基上，是一种周边立柱，上有顶盖，四周或前后檐无墙的建筑。在中国神庙建筑史上，这是一种新出现的单体建筑类型，因无成规可循，可能受，到唐代所谓“舞楼”之称的启发，以及其表演乐舞的实际功能的考虑，山西民间创造性地将这一建筑命名为“舞楼”。

在中国舞台发展史上，有一种叫做“露台”的建筑承前启后，十分重要。露台，就是在地面上筑一方形高台，因露天而立，故名^{24[24]}。在汉、唐、五代到北宋，神庙中就经常出现露台。伴随着中国表演艺术的历史演进，露台上也多半上演歌舞百戏。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载，宣和时，汴京万胜门外神保观，俗称二郎神庙，传说六月二十四日为神祇诞辰：

天晓，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趯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鸡、说诨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扑、浪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倬刀、装鬼、研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至暮呈拽不尽。^{25[25]}

这是对当时民间神庙露台演出内容的详细描绘。由上可知，露台上表演的是歌舞百戏。这是因为宋、金时期，戏曲还处于形成

^{24[24]} 参见薛瑞兆《宋代露台考》，《戏曲研究》第8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235页；拙著《中国神庙剧场》第二章《露台的兴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39-56页。

^{25[25]} 《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53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点校本，1998年。

期，未完全成熟，虽然宋杂剧在教坊十三部中为正色，但它毕竟只是散乐中的一种，还未从百戏中独立。百戏杂陈，需要有一个共同献艺的场地，而上无顶盖、旁无遮拦的露台正好适应它的需要，于是兴盛起来。而上有顶盖，四面或一面观的舞楼的出现，被视为中国舞台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飞跃。因为它的出现，表明戏曲从百戏中逐步分离，开始独立、形成。在方形基座上立四根角柱，有固定的顶盖，有的还砌起一面山墙，这一方面更有利于观众欣赏细腻的表演与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则在空间上设置了种种障碍，增加了一些限制，将原来与戏剧混杂在一起同台表演的其它百戏伎艺剔除出去，典型的如顶幢、爬竿等。而舞楼、舞亭、乐亭、乐棚等建筑是在露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从祠庙戏台多为方形，位置与露台一致等方面可得知，且《东京梦华录》有露台上设乐棚的记载^{26[26]}。北宋都城神庙中舞楼、乐棚何时出现，无法得知，所幸的是，在山西中南部发现了四通有准确纪年的记载北宋舞楼创建的碑刻，意义重大。其余三通碑刻所论已夥，兹不赘述。本文披露的这通碑刻首言“盖闻祠堂古建，舞楼新修。”这可以理解为本座祠堂建筑较早，而舞楼则是本次（大观三年）新修的。后文有称舞楼为“舞宇”，并赋诗曰：“祠堂舞宇今千年不朽，山川漳水今万世无穷。”考古学中的类型学理论认为，任何文化类型的遗物、遗迹的出现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它一定有其特别的时代、范围，会成群出现。长子县南鲍村汤王庙北宋舞楼碑刻的新发现再次印证了这一理论。

南宋中期，南戏产生，大约金代后期，在金院本中出现了北杂剧这种新的戏曲形式。南戏与北杂剧都是成熟的戏曲。就在这时候，露台开始出现衰落，上有顶盖，四面或三面观的舞楼、舞亭、乐亭、乐棚大量出现，到元代，已蔚为大观。据笔者多年调查统计，现存金代戏台 1 座，元代戏台及其遗址 12 座，金元戏台资料

^{26[26]} 《东京梦华录》卷八，《东京梦华录（外四种）》第 53 页。

（实物不存者）22种^{27[27]}。这说明一旦戏曲成熟，与其它表演性时空艺术相分离，就需要一个更专门的演出场所。那些无法在舞亭上表演的百戏伎艺只好另选场地，回到露台下更为宽阔的广场。

总之，晋南、晋东南神庙中的四座北宋舞楼的创建，确实堪称开神庙剧场风气之先，值得我们倍加重视。

作者：车文明，男，1961年生，文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发表有《二十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等。

原载《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有增补。

^{27[27]} 参见拙著《中国神庙剧场》第一章第二节《金元戏台研究回顾》，第26-30页。